

中国西部历史文化丛书



王权评传

王效琦 著

俾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王权评传

王效琦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权评传/王效琦 著.—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2

ISBN7-5043-439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108035号

I.王… II.王… III.王权-传记

IV.G22-53

王权评传

著 者：	王效琦
责任编辑：	刘耀钊
装帧设计：	高 峰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 (邮政编码 100045)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图文印刷厂
开 本：	850毫米X1168毫米 1/32
字 数：	200千
印 张：	10印张
插 页：	10页
印 数：	1000册
版 次：	2005年3月第1版 2005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7-5043-4394-3/G.1710
定 价：	2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序

霍松林

晚清时期，在我的家乡一带出了好几位学者而兼诗人、文人、教育家的杰出人物。和我因缘较深的，首先是任士言先生，其次便要数王权先生了。任先生以名进士辞去京官，献身教育，任天水、陇南书院山长近30年，著述宏富，《清史列传》有传。家父众特先生（1879—1959）住陇南书院时深受任山长赏识，于执经问业时经任山长介绍，得识在座的王权先生，此后也经常请教，受益良多。我幼年在家中读群经子史，直到12岁才入小学。家父在指授要义奥旨之余，往往要讲到任山长的道德文章和他如何教导门人，有时也讲到王权先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任山长的不少著作早就出版了，所以他的《敦素堂诗文集》等，我上中学时就读过。王权先生的著作则在生前和死后很长时间都未见出版，有些诗文名篇，是靠传抄受到人们的赞誉的。所以直到1990年，我才读到路志霄先生寄赠的由西北师大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印的《笠云山房诗文集》。

王权（1822—1905）字心如，号笠云，甘肃伏羌（今甘谷）县人。22岁中举后历任文县教谕及文昌、天水、正兴、兴文四书院山长，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培养了许多品学兼优的英才。其论学要义，见于《正兴书院劝学诗五首》：“人士不努力，昆仑成饭颗”，或如昆仑之伟大，或如饭颗之渺小，关键

在于是否努力学习；“后生勿自薄，真美不外贷”，只要加强学养，人人都有“真美”，这“真美”是自有的，不是从别处借贷的；“植品信有门，去利乃其钥”，不受富贵利禄的诱惑，才能培植高尚的品德；如此等等，可以看出他的教育思想，至今还值得我们借鉴。

王权 50 岁以后，历任延长、兴平、富平知县，政绩卓著。当时正是清军镇压回民暴动之后，城乡残破，人烟稀少，田园荒芜，缺衣少食，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而劳役赋税仍有增无减。王权从革除弊政、提倡节俭入手，设粥厂、散棉衣，招人垦荒，分给耕牛籽种，使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光绪 7 年（1881）陕西大旱，王权上报到省上的兴平产粮数量比全省其他各县都少了许多，主省政者力图讨好清廷，讳言灾情，责令王权改报；而王权据实力争，坚决不肯改报。接着，省上檄令各县续捐义谷，王权又据理力争，因而被解印罢官。他去官之日，兴平士民赴省啼泣挽留，主事者只好令其回任，于是他又做了许多革弊除奸、减负利民的好事。他为民请命而不畏权贵、不顾个人安危，驻藏大臣过境，从者勒索钱财，他责以重杖。他任富平知县一年多，以为先人修墓为由，三次申请辞官归里而士民再三挽留，咸宁知县也写信劝他留任。他在《复咸宁樊明府书》中说：“小民之欲恶（wù 憎恨）与上官之喜怒，迥不相通也，且显相背也。从民，则拂上；从上，则拂民。以陕西近年之政言之，义仓积谷，上以为利，民以为害；年谷，上谓之丰，民谓之歉；……”处于小民与上官之间的知县，“即有敏达宏才，竭智虑以调剂乖违，尚格格乎不能两合；况以鄙人之疏拙，年齿已暮，神志已颓，……凯交孚于上下间也，阁下以为能乎？”基于这种深切的感受和体认，他坚决弃官归里，闭户著书。

王权在延长、兴平、富平任职期间和离任之际，士民都有

立碑制屏歌颂功德的强烈要求，他都严辞拒绝。例如自兴平移官富平时，全县士民将制锦屏以颂政绩，推明经张伯良主其事。王权听到后在《与明经张伯良书》中说：

……凡人处施、受之际，厚则相忘，薄则相耀。父母之与子女，谋其饱暖，计其久长，成其德艺，禁其僻邪，苟心力所可及者，靡不殚致焉。然为之子女者，若知若不知，若受若未受，未有感激称道而为文辞以颂扬之者，此所谓厚也。不使其子知感者，父之厚于其子；受父之恩而忘感者，子之厚于其父。相孚以天，故人为无白参之。自此而宗族、而姻党、而乡邦交游、而疏逖异域，分愈疏，施愈浅，扬诩推美之文愈盛，无他，谊薄故惠彰，情薄故誉溢耳。今之牧令能子民者罕矣，然官以‘父母’为称，民以‘父母’见呼，则官、民之相与，当以厚欤？与以薄欤？

这段文章中的“分”(fèn)、“谊”、“情”三字应该特别注意。“分”与“谊”都指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愈密，情感愈深，则彼此之间的“施”(付出)与“受”便“厚”，“厚则相忘”。父母对子女，其“施”无微不至，也没有任何条件，根本不想让子女知道他们在“施”，这就是“厚”——父母对子女“厚”。做子女的，也不注意父母对他们“施”，即使注意到，也以为本应如此，不会写文章表示感激之情，所谓“厚则相忘”。与此相反，关系疏、感情浅，在受“施”之时便要感激一番。古人称地方官为“民之父母”，“今之牧令能‘子民’（像父母对待子女那样对待人民）者罕矣”！但县令仍自称“父母官”，小民仍呼县令为“父母官”，那么县令对小民，小民对县令，究竟应该是“厚”，还是应该“薄”呢？如果“厚”，那么“厚则相忘”，还用得着“感激称道而为文辞以颂扬”吗？负责“感激颂扬”之事的张明经读信至此，大概已无辞反驳；而王权的信又从此生发，层层转折，愈转愈深。这里只撮述其中的一层意思：做一些有利于民的事，这是县令的“职责”，不必“报”。如果真的感激图报，那么“思其人，服其教，相

与力农桑，戒争斗，敦孝弟，远刑辟，使狱讼日以息，风俗日以醇，则所以报官者大矣！”总之，他以无可辩驳的种种理由，谢绝了兴平士民的颂扬；在延长、在富平，也是这样。这几县都为他立有纪功碑，但都是他离任以后建的。

在他那个时代，贪官好做，清官难做，但清官还是有的。这些清官，大都是深受孔孟民本思想的哺育而敦品砺行的学者。王权如此，王权的老师陈雪炉如此，王权的学生张育生也如此。王权的《送张育生之官甘泉序》，总结他做地方官的实践和体认，谆谆告诫张育生在好官难做的情况下如何做好官。他首先强调指出：当今做地方官的只顾“尽心于上”，“上官曰‘行’，民虽病之弗罢也；上官曰‘罢’，民虽利之弗行也。探伺捷于机先，揣测及于幽隐，而闾阎之病苦，政令之乖违，勿恤也”。这样容易升官，但不是好官。要做好官，必须“尽心于下”：“苟利于民，上官曰‘勿为’，弗敢已也；苟不利于民，上官曰‘为’，弗敢徇也。民安则心怡，民病则心凄，而上官之喜怒，己身之利钝，勿恤也”。按他这样说，要做到“尽心于下”，已经很困难，但他又进一步指出，仅仅做到“尽心于下”，还不一定是好官，因为在做到“尽心于下”时可能会产生三种“恃”，而“恃”是有流弊的。“操非廉不立，而廉不可恃，恃廉则嗇，嗇之流也刻；职非勤不举，而勤不可恃，恃勤则躁，躁之流也蹙；事非明不判，而明不可恃，恃明则察，察之流也苛。”能“廉”、能“勤”、能“明”而不“恃”以免产生流弊，这就好了，但还要杜绝三种“歧途”：“一曰诡异以动物，一曰纷更以凯功，一曰姑息以媚众。”关于第一种歧途，他说：“良吏之视民，家人耳；其视民事，家事耳。自好名者为之，乃有骇俗之奇迹，逾量之殊恩，出众之谪智，的然揭己以与民市，赫声骤播于外，真意早漓于中，则诡异之过也。”关于第二种歧途，他说“利弊难逆睹也，兴革

难轻试也，挟喜事之成心，凿空造端，张皇旦夕，令未行而民先扰，效未睹而弊已丛，则纷更之过也。”关于第三种歧途，他说：“刑威者起痼之药石，法令者制奔之辔策，以轻刑为惠，以执法为慈，将使奸民贺而良民戚，此姑息之过也。”这三种“歧途”，是他对官场现状的概括和针砭，他慨叹道：“嗟呼！今之牧令贤且能者众矣，然吾察其所挟持，未有外此三途者也。”走此三途中的任何一途的，都还不是贪官、庸官，而是“贤且能者”，但对于做好官来说，这都不是正路，而是必须杜绝的“歧途”。接下去，王权又对他的门生指授了杜绝歧途而在正路上迈进的诸多要领：“杜歧途，修实事，可以骤行之而不窒、久行之而不敝者，其简乎！可以济简者，其严乎！累民之事万端，而皆由烦出，一简则众累祛焉。奸猾之害万变，而皆由宽生，一严则百窳塞焉。然简非疏之谓也，严非忍之谓也，所以行之者诚而已。既诚矣，则简与严其无失矣。犹不敢满也，平其心以防意气之偏，虚其心以省愆尤之伏。一日在此官，一日存此心，勿闲之而已矣。”结尾一段，回到“送张育生之官甘泉”的题上：“甘泉治北山之冲，兵饥洊仍，土荒民散，抚辑尤难为力，然苟以吾说处之，民病倘有瘳乎！呜呼！讲吏道以救疲氓，吾知育生之急于行也。”既勉励，又激励，更寄托无限期望，真可谓语重心长。可喜可敬的是：张育生以卓越的治绩回报了老师的教导和期望。他先任甘泉知县，继而因士民挽留连任多年渭南知县，以至放弃了升迁的机会，在当时和事后多年，关陇一带的士民都称他“张青天”。

在晚清同治、光绪时期，王权是蜚声陇右、关中的诗人、文人。对于诗，王权有他自己的理论。他往往把作诗和用兵联系起来。如在《帝余斋诗集序》中说“诗犹兵也，恃才则僨，恃学则胶。奉古名将为师，综其法制，识其方略，遽曰‘我能兵’，于应敌也殆矣！抱前人遗编，摹声揣色，论曰‘我能

诗’，于风雅也远矣！”对于用兵，他强调的是“不袭成法”，“神明善变”；对于作诗，他强调的也是“脱弃蹄筌”，“神明善变”。又在《谭西屏诗集序》中说：“夫诗之与兵，果有二道乎哉？兵贵谙习古法而不泥古法；诗贵陶铸古人而不袭古人，一也。兵以士马甲仗壁垒部曲为实，而其胜也常以虚；诗以经史典章见闻根据为实，而其运也常以虚，一也。兵贵因敌设变，而运作之妙存乎心；诗贵因物赋形，而哀乐之感存乎内，一也。……方其行兵，伸缩纵控，无一非诗意也；方其为诗，奇正变化，无一非兵机也。”以兵论诗，古今罕见，王权以兵论诗而深中肯綮，可谓出奇制胜。

王权蒿目时艰，忧国忧民之情不能自抑，往往溢而为诗。清咸丰10年(1860)，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侵略军侵入北京，侵占大沽炮台，劫掠圆明园珍贵文物，焚毁圆明园，清廷被迫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和《中法北京条约》。王权闻讯悲愤异常，作《愤诗》五言古风四首。其第一首以“渤澥大波震，瀕洞天日昏；中有万蛟鳄，喷毒凌北辰”写侵略军自海上长驱直入，进犯北京；以“群仙正宴饮，散作流星奔；……天狗不搏噬，摇尾何其驯”写正在“宴饮”享乐的清廷君臣仓皇奔窜，“摇尾”求和；以“巍巍玉京阙，竟使鳞介蹲，……议倾天库宝，掷向海洋濬”写侵略军占据北京，清廷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条约；以“呜呼云路迥，怀愤谁能询；弃官访壮士，今日何乾坤”抒发了责问朝廷的愤慨和欲访壮士御侮雪耻的雄心壮志。作者很懂得“物腐而虫生”、“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的哲理，全诗既鞭打侵略者，又对清廷的荒淫、腐朽给予深刻的揭露和斥责，其奋发图强之意跃然纸上。从艺术上看，造句挺拔凝炼，行文转折灵动，通篇融描写、叙述、抒情、议论于一炉，叙事清晰而状溢目前，激情卓论即从中喷涌而出，感人至深。

王权做地方官多年，对官场黑暗、农村凋敝感受至深，在诗中的表现也至为深挚真切，七古《乡农叹》和五古《述怀七首》就是这方面的佳作。外而列强侵略，内而农村凋敝、赋役繁重，朝政腐败、官场黑暗，这是当时中国岌岌可危的基本形势，王权触目惊心而发为吟咏，时代风云与忧患意识熔合无间，堪称诗史。

王权长于古风，五古、七古篇什极多，质量亦高；但近体也自出心裁，别开生面。举七绝数首为例：

河山雄要几兵争，瑟筑悲欢处处情。

仆本恨人多感触，又何心绪访卢生！

——《邯鄲》（其三）

以《邯鄲》为题的诗多借卢生一梦发挥，如“四十年来公与侯，纵然是梦也风流。我今落魄邯鄲道，愿向先生借枕头”之类。王权此题共三首，前两首就信陵君救赵等史事发挥，故第三首写“兵争”感触而以“又何心绪访卢生”收尾，既不落俗套，又见出所关心者不在富贵，境界甚高。

偶尔凌空筑土堆，剧辛乐毅一齐来。

招贤底事金为饵，我谓金台是钓台。

——《黄金台故址》（其二）

燕昭王筑台置黄金招贤，剧辛、乐毅联翩而至，后代寒士也无限神往；而王权却讥为用重金钓大鱼，不尊重贤人的人格。

爆竹通宵搅客眠，晓来山翠落帘前。

今年元旦真惊喜，华岳三峰来贺年。

——《除夕宿华阴》（其二）

陈世焯《赠王权》谓其“笔下有风云，眼底无富贵”，任士言《书心如集》谓其“追锋飞马足，入握炼珠光。势捷生廉悍，神来动激昂”。其人品诗格，于此可见。

论者谓王权“古文胎息韩、柳”，而读《笠云山房诗文集》中的一百几十篇古文，觉得远非韩、柳所能范围。其突出

特点是：立意高，说理透，层层转折，愈转愈深，辞彩流美而内涵深厚，绝无空洞、俗浅之失，前面讲到的《送张育生之官甘泉序》即可见一斑。我认为：其诗其文各有千秋，文的成就更胜于诗。

光绪初年，王权与谭麟、万方煦、毛凤枝、毛凤清、谢威风、秦毓琪、刘开第、彭询、席裕驹、赵元中、李嘉绩等在西安成立“青门萍社”，赋诗作文，讲学论政，影响遍及关中陇右。关于这个诗社，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谭麟传》有记载，王权诗文中也多次提到，现在知道的人已经很少了。

顷接甘谷党校王效琦先生函，说他正撰《王权评传》，不能没有我对王权的评论，因而重读《笠云山房诗文集》写了这篇读后感。王权是值得研究的，今年秋天恰恰是王权逝世100周年，我认为甘谷应举办一次王权研讨会以示纪念。王权著作宏富，其《舆地辨同》、《辨同录》、《典防》、《诂剩》、《童雅》、《炳烛杂志》等也应该整理出版。

兴犹未尽，赋七律《王权逝世一百周年纪念》：

风雨飘摇忆晚清，哲人奋起伏羌城。
为官只顾苏民困，讲学真能育国英。
抒愤高吟曾警众，图强卓论尚骇鲸。
家乡喜设百年祭，华夏腾飞万里晴。

2004年夏写于陕西师大博导南楼

目 录

序	霍松林 (1)
---------	-----------

第一章	伏羌槐庵有吉梦	(1)
第二章	少年才俊王心如	(21)
第三章	漫漫古道求学路	(39)
第四章	教书不忘忧天下	(57)
第五章	荐梅移梅遇知己	(91)
第六章	羌寨招抚显才华	(109)
第七章	投笔从戎效国家	(133)
第八章	北京之行步宦海	(159)
第九章	交游天下小税官	(185)
第十章	赈济民生疗兵荒	(207)
第十一章	轻徭薄赋为百姓	(239)
第十二章	刚直不阿强项令	(261)
第十三章	辞官别友归故里	(285)
尾 声	燃尽生命著丰碑	(299)

后记	(306)
----------	---------

第一章

伏羌槐庵有吉夢

晚清时代，中国社会在政治上风云变幻，内忧外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尖锐，但支撑整个社会的农耕经济的基础仍然没有变化。而此时的西方国家，经过数百年的工业革命，早已进入到一个新的文明时代。

从晚清始，我们的民族在一个多世纪惨痛的血淋淋的拳击比赛经历中，终于学会了现代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游戏规则，重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今天，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许多人把我们曾经被列强瓜分和凌辱，把我们民族的悲剧归咎于我们的文化。其实，罪不在文化，而在于人们（主要是统治集团）的心态。我们的文化曾经创造过汉唐辉煌，但当长期闭关锁国，固步自封，拒绝以开放的态度学习其他先进文化的时候，由泱泱大国逐渐边缘化，沦为远东的“乡巴佬”就势在必然。

王权生活在中国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代，从他的生活轨迹和文学创作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领域的变迁，可以认识到我们这个被儒、佛、道文化熏陶了千百年的农耕民族在工业革命快车前的迷惘，以及觉醒的艰难历程。

甘肃，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蕴育诗人的沃土，梁陈之际的阴铿，博涉史传，尤善五言诗，杜甫称赞说：“李信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其诗句超凡出群，可窥一斑。到唐代，对中国诗歌发展有深远影响的三李，皆出白陇上。李白号为诗仙，其诗歌想象奇特而丰富，意念常驰骋于浩渺无垠的宇宙之间和悠远无垠的时间隧道，可谓独步古今，无人可以企

及。李贺号为“鬼才”，其诗歌创造形象的奇诡瑰丽，语言锤炼的呕心沥血，构思谋篇的独辟蹊径，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大家。李益诗歌既有清丽凄婉的一面，又有豪迈奔放的一面。到明代，李梦阳、胡纘综、赵时春都是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特别是李梦阳为明代文坛领军人物。清代吴镇、任其昌、王权诗歌卓尔不群，骨力坚苍，意味深厚，各有千秋，在清代文学史上各占一席之地。王权不仅是诗人，也是文人、学者，他是文章大家，著名学者霍松林先生评价其文“立意高，说理透，层层转折，愈转愈深，辞彩流美而内涵深厚，绝无空洞、俗浅之失”。王权又是清代甘肃最著名的三个学者（邢澍、张澍、王权）之一，著名学者陈声聪评价说：“陇右……魁儒硕士，代有传人。汉著作家张奂、书法家张芝父子，南朝诗人阴铿，唐诗人李益，唐文学家赵武孟、赵彦昭父子，明诗人李梦阳，清学者邢澍、张澍，其尤著者也。清末有伏羌县人王权者，挺生其间。”

伏羌县，秦汉时称冀县，在陇右诸县中，人文称盛，为陇上文薮。早在 3000 多年前的春秋战国，冀人石作庶就千里跋涉，前往鲁国，求学于孔子，成为孔子三千门徒中最有成就的七十二贤人之一。从隋唐科举取才直到 1904 年废除科举的 1000 多年的时间里，甘谷考中的进士在甘肃各地排名中位居第七。明清之际，博学奇才，为世人推重，对陇文化做出贡献的有王羌特、黄虞再、潘钦岳、巩建丰，李则广、魏仰斋、王海涵、田骏丰等贤达。

沿着渭河溯流而行，到上游甘谷县（唐至清称伏羌），有由渭河冲积而成的宽约十里左右的狭长川带，川的南部便是《禹贡》记载的朱圉山。朱圉山的南部有巍峨的石鼓山，北部濒临渭河有大像山，著名的唐代石胎泥塑大佛便凿于大像山

上。距大像山西南约五十里，便是雄奇秀丽的无畏山。

《甘肃通志》记载，“无畏山，在县西五十里，高险奇秀，突出云霄，其巅云飞即兆雨，中有灵泉。”无畏山的灵泉，潺潺涓涓流到山麓，便形成一条小河，蜿蜒西流，汇集到古代《水经注》中所述的温谷水，经东坡峪、尉家沟、张家沟、毛家坪等村后流入渭河，而后匆匆东去，汇入黄河奔向大海。无畏山集高、险、奇、秀四大特征于一身，堪称甘谷县内的名山。

高。无畏山居群山之上，欲与天公试比高。如登临山巅，环眺四方，只见脚下云卷云舒，万山奔涌如大海的波浪，而无畏山就是无数波浪中高高地卷起的一个巨大的浪头。此时，你可以领略到“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壮阔雄伟的意境。

险。无畏山险峰随处可见，有漫长的陡坡，突兀的峻岩，壁立千仞的悬崖。黑色的悬崖绝壁上有苍鹰筑巢，苍翠的松树里，松鼠嬉戏，狐奔鹿窜，野狼出没。沿着崎岖的小道攀缘而上，到达山顶，俯视脚下，令人头晕目眩。

奇。无畏山透着奇异和奇妙，“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随着视角的变化，它呈现给人们的形象不同，给人的美感也迥异。山奇，山间石头也奇。有的如卧虎，如蹲象，如匍匐的巨龟，悄无声息地守候着什么。有的则如奔马，如怒狮，如仰天长啸的巨猿，活灵活现地追逐着什么。更为奇妙的是无畏山的灵泉，盛夏凛冽清爽，隆冬湿润宜人，是天然矿泉水。

秀。无畏山在高险中透出娟秀，在雄奇中展现出清纯，在沉默中表现出灵气，尤其当淡淡的轻雾暮霭笼罩，她隐隐约约的身姿犹如身披轻纱的妩媚少女。每到山雨欲来，她总是云缠雾绕，阴雨将晴，又总是云收山顶，犹如沐浴后或梳妆后静静地露出笑脸的闺阁女子。——这便是无畏山的兆雨作用，她似

乎有着令人不可测知的灵气，这兆雨便是这灵气的神奇展现。

无畏山下，镶嵌着一个微型袖珍盆地，清代人们称为银川，后又称为金川。金川在清代是伏羌县的安山里，民国又改为无畏乡，解放后改为金川乡，2004年合并于磐安镇。

在被称金川的袖珍盆地，坐落着七个自然村，其中水沟村就是清末陇上诗人、学者王权的出生地。

公元1822年11月14日（道光二年十月初一），伏羌安山里水沟村秀才王汝揆的屋里，灯火一直亮着，请来的接生婆守在炕沿边，不时和产妇原氏说几句。原氏从傍晚即感腹疼，算来生产即在近几天，于是打发丈夫向婆母告知，婆母立刻差遣儿子请来村里的接生婆。接生婆是村里穆家婆婆，水沟村一大半孩子是经她的手接生的。穆家婆婆到了，便要原氏丈夫和婆婆都到上房去，她接生旁边是不要闲杂人的。王汝揆要做父亲，心里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兴奋之中又有一份沉重的责任感在心中油然而生。他扶着母亲到了上房，劝父母歇息。

王汝揆父亲号槐庵，因其宅西北有一参天古槐而取号。此时他已年近古稀，家里大小事务均已由王汝揆料理。槐庵公年过四十才得子，对王汝揆自小虽疼爱，但从不骄纵。儿子稍省事，便极孝顺，极勤谨，也极为好学，这使他心里为之宽慰。

“既老，戒之在得”。他已深居简出，精神好时，戴上老花镜，翻翻《四书》《五经》。想走动时，便走到田间地头转悠转悠。看到儿子把庄稼料理得如同他写的楷隶篆草，心里便想：这要归功于圣人之学。自己严格家教，从小以孔孟圣训教育孩子，严守圣人之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为儿子做出了表率。“子不孝，父之过”，儿子不孝不忠，皆与父母教育有关。

儿媳原氏临盆在即，想着自己可以活着看到孙子，槐庵公内心快慰极了。平日，看到儿媳身孕一天一天凸出，恨不能即